



社会发展译丛



平等与效率

重大的抉择



[美] 阿瑟·奥肯◇著 陈涛◇译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 Off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平等与效率

重大的抉择



[美] 阿瑟·奥肯◇著 陈涛◇译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 Off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 - 2012 - 8159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美]阿瑟·奥肯著·陈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

ISBN 978 - 7 - 5161 - 1757 - 6

I. ①平… II. ①阿…②陈… III. ①平等—关系—经济效率—研究
IV. ①F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9054 号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 Off©1975,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2012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 赵剑英

特约编辑 孙 萍

责任编辑 王 茵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6.5

字 数 120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会发展译丛》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李汉林 赵剑英
编 委 渠敬东 折晓叶 沈 红
葛道顺 钟宏武 高 勇
项目统筹 王 茵 杨清媚

《社会发展译丛》编辑部

主 任 王 茵
成 员 夏 侠 喻 苗 侯苗苗
孙 萍 韩国茹

前 言

当代美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层级结构。它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提供了普遍分配的权利，和声称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特权。但是它的经济制度却依赖于市场决定的收入，后者产生了公民之间在生活水平和物质福利上的实质差异。这种收入上的差异旨在提供激励——奖励和惩罚——以便促进资源使用的效率，并形成一個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国民产出。

平等的权利和不平等的收入的混合结果是造成了民主制的政治原则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之间的张力。市场奖励上的某些赢家使用金钱来获取权利的额外帮助，而这些权利应该是平等分配的。他们中的某些人获得了抢先起跑的优势，从而导致了机会不平等。对于在市场上获得惩罚的某些人来说，由此而来的结果是，某种程度的剥夺与人类尊严和相互尊重的民主价值观相冲突。某些经济政策被设计出来以便降低不平等的范围和大小，因为这些不平等削弱了生产的激励并损害了经济效率。社会在许多地方都面对选择：或者以效率为代价提供更多的平等，或者以平等为代价提供更多的效率。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就是在平等与效率之间产生了权衡（tradeoff）。

这个权衡就是阿瑟·奥肯这篇论文的主题。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作者都把学术上的精力集中在与此相当不同的权衡上。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学生、耶鲁大学的教师、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成员和之后的主席，以及自1969年开始作为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名资深研究员，奥肯本人主要关注的是嵌入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权衡上的未被解决的难题。在这篇论文中，为了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在他看来更迫切和更广泛存在的权衡，他暂时告别了他的主要关注点，而带着甚至更大的关切。

本书（以及它的主题）的基调和特点记录了作者的价值观、判断和经验，并使其区别于奥肯的其他专业著作。就其本身而言，它聚焦于奥肯更为

妮·卡伯特森提供了大量的研究帮助以及有价值的批评，南希·德兰尼熟练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并准备了索引。伊芙琳·费舍尔增加了事实资料的精确性。玛丽·格林以其耐心和准确准备了许多手稿的草拟。孟德尔·伯伦森提供了富有见地的编辑帮助。

本书表达的是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官员或其他工作人员的立场。

克米特·戈登 会长
1975年3月于华盛顿

目 录

| | |
|-----------------------------------|------|
| 第 1 章 权利与金钱 | (1) |
| 权利领域 (THE DOMAIN OF RIGHTS) | (4) |
| 金钱对权利的侵犯 | (15) |
| 第 2 章 对市场的论证 | (22) |
| 为什么是资本主义? | (22) |
| 市场上的权利和自由 | (24) |
| 奖励的伦理学 | (28) |
| 效率性的记录 | (34) |
| 集体化经济 | (36) |
| 结论 | (42) |
| 第 3 章 收入平等与机会平等 | (45) |
| 经济福利的分配 | (45) |
| 机会平等 | (52) |
| 使机会平等化的可能性 | (57) |
| 第 4 章 在一个效率经济中增进平等 | (61) |
| 妥协的范围 | (61) |
| 装满提桶 | (70) |
| 针对低收入阶层的援助 | (74) |
| 结论 | (82) |
| 索引 | (84) |

第1章 权利与金钱

美国社会宣扬每个人的价值。所有公民都为平等的公正和平等的政治权利【1】所保障。每个人都获得了来自消防部门的迅速反应的承诺，并且每个人都有瞻仰国家历史遗迹的权利。作为美国公民，我们是同一个俱乐部的成员。

但是同时我们的制度又说：“找一份工作干，否则就挨饿”，“成功，否则受苦。”它在告诉我们要在社会上与人保持一致的同时，又催促我们在经济上跑到邻人的前面。它所提供的奖励，使得优胜者对宠物的饲养，胜过失败者对其子女的养育。

这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公开宣称并追求一种平等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却又同时产生经济福利上的巨大的不平等（gaping disparities）。平等与不平等的混合，有时含有矛盾甚至是不真诚的意味。但我相信，在许多情况下，制度的安排代表的是令人不安的妥协，而不是根本的矛盾。美国家庭之间在生活标准与物质财富上的差距反映了一种奖惩体制，这一体制力图鼓励人们的努力奋斗，并把它引入社会生产活动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体制成功了，它产生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但是，追求效率必然创造出不平等。因此社会在平等与效率之间，面临着一种权衡（tradeoff）。

权衡是经济学家的核心研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You can't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是对经济分析的基本定理的良好说明。多生产某一种东西，意味着使用了可以投入对其他东西的更多产出上的劳动力和资本。现在多消费那就意味着为了未来省下得少了。工作更长时间就侵占了闲暇。反【2】对通货膨胀就要牺牲产量和就业，而这提出了国家现在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权衡。

我毕生都在专门研究如何权衡通货膨胀与失业。委婉地说，寻找应对它

的令人满意的方式仍没有被成功地实现。但就我而言，我还没有放弃，实际上，我计划把我剩下的研究生涯仍然放在这个难题上。不过，在这项研究中，我暂且离开我通常的关注，去讨论一种恐怕是更为令人困扰的，也更为流行的权衡，即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权衡。而且，它在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困扰着我们。我们无法在拥有市场效率这块蛋糕的同时，又平等地分享它。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就像对于工程师一样，效率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投入中获得最大的产出。生产中的投入包括人力，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的服务，诸如机器、厂房等，以及像土地、矿产资源一样的自然资助。产出则是成千上万不同类型的货物和服务。一旦社会发现一种方式，能够以同样的投入，转化出更多的某种产品（并且其他产品并因此而不减少），那么它在效率上便获得了增长。

效率概念意味着越多越好，就“多”所包含的项目是人们想要购买的东西而言。像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我也认为消费者的意见是其需要的指示，并认为，人们的选择就是关于什么东西能使他们过得更好的适度理性的（reasonably rational）表述。当然，根据不同的一套尺度，这样质疑是合理的，即通过生产更多的威士忌、更多的香烟以及更多的大型汽车，人们是否能够过得更好（因而社会是否真的变得更有效率）？这个质问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想要他们所购买的东西呢？人们的选择又是如何被教育、广告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所影响？是否存在某种尺度，借助它，福利能够比观察人们所做的选择那样，更好地被评价？不用辩护也不用申辩，让我干脆说我不会探究这些议题，不管它们的重要性如何。这仅仅反映我的选择，不过我希望它被接受为适度理性的。

我在本质上更坚信，能够忽略第二种类型的批评，即对“越多越好”的效率概念的批评。有些经济学家警告说，今天经济增长在带来更多的产出时，可能会掠夺地球资源，并导致将来更低的生活标准。其他经济学家最近已经回应了这一“末世论”学派的挑战，并且在我看来，他们已经有效地反驳了这种极端的预测。

经济平等的概念也提出了它的问题，我将在第3章充分地探讨这一点。我以更多或更少的平等表示家庭之间在可维持的生活标准上较小或较大的差距，进而表示，相对于不同规模的家庭需要而言，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更小或更大的差距。相等的生活标准，并不意味着人们将会同等地花费他们的收入和分派他们的财富。经济平等并不意味着同样、单调或一致，因为人们有

着相当不同的品味和喜好。今天，在任何一个收入阶层中，都有某些家庭比其他的家庭在家庭开支上花费更多，而在教育上花费更少。经济平等明显不同于机会平等，正像我在使用这些术语时那样。我将在第3章中更进一步探讨这种区别。^①

出现效率与平等之间的权衡，并不意味着每个东西对一方来说是好，就必然对另一方是坏的。一方面，可能榨取富人的举措也同样会破坏投资，因此损害穷人的就业质量和数量，因而可能既有有害于效率也有有害于平等。另一方面，提高了无特殊技能的工人的生产率和收入的技术，也会以更高的效率和更大的平等有益于社会。但是，有些地方这两个目标是冲突的，这就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经济领域内的冲突将在第2章讨论。第2章将分析市场联合创造不平等和效率的方式。在第4章中，我们将考察联邦政府的政策通过何种方式来试图借助诸如累进税、社会保险、福利和职业规划等举措，去推动由市场产生的财富和收入以朝向更大的平等。

在本章中，我将考察美国社会通过建立社会和政治权利以促进平等（并在效率方面付出了某些代价）的方式。这些权利被平等地和普遍地分配，并试图用来维持市场。它们能够影响经济的运转，同时它们的运用也被市场所影响。它们基本上处于政治科学家的领域之中，而几乎很少为经济学家们所接触。但是有时候，经济学家不能忽略它们。市场制度与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被置于整个社会结构——包括平等被赋予极高优先性的地方——的背景中时，就被澄清了。

一个既是民主的又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有一个层级制度结构，并且这两个层级都需要被研究。当只有资本主义层级被考察时，有关物质福利分配的问题并不是关注的对象。在一个主要建立在私人企业之上的经济中，提高平等程度的公共努力代表了某种对市场产生的结果的审慎的干预，而这种干预是有代价的。当提出“政府应当干预市场吗”这样的问题时，不言自明的回答是响亮的“不”。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它是反平等主义者的共同道路。他们忘记了《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人类平等，也不顾《人权法案》，而我们可

^① See William D. Nordhaus, "World Dynamics: Measurement without Data," *Economic Journal*, Vol. 83 (December 1973), pp. 1156 - 1183; and Robert M. Solow, "Is the End of the World at Hand?" in Andrew Weintraub, Eli Schwartz, and J. Richard Aronson (eds.), *The Economic Growth Controvers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3), pp. 39 - 61.

以说也只有知识分子，与人民明显不同的人，才会关心平等。^① 伴随着这些盲目的人牢牢地占据了某些位置，经济学中的平等主义就像是一种怪癖，或许甚至是像精神病一样而受到审查。^②

把拥有巨额财富或高额收入当做它们的所有者的缺德的迹象和罪恶行为，或当做是对平等社会的失察，这是片面的。市场经济制度促成了这种不平等，但它们与追求平等主义目标的各种社会或政治制度一样，是我们社会架构的一部分。对有些人来说，“利润”和“富有”可能是肮脏的字眼，但他们的观点在经济游戏的规则中从没有盛行过。

为了获得一个合适的视角，甚至一个缺乏其他社会科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也最好涉足——哪怕是踮着脚尖——社会和政治领域。这就是我将要起程的地方。我将穿过那些社会审慎地选择平等的地方，留意这些选择调和效率和约束市场作用的方式，考察社会为什么可以选择平等地分配它的某些权利资格（entitlements）。我将特别聚焦于在建立和贯彻某一原则时的某些困难，这个原则就是平等分配的权利不应以金钱来买卖。

权利领域（THE DOMAIN OF RIGHTS）

【6】大量的权利资格和特权被普遍地、平等地和无偿地分配给了所有美国成年公民。法律赋予我们获得平等的公正的权利、行使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选举权利、寻找配偶和生育的权利，在免除奴役的意义上的人格自由的权利，通过移民方式脱离美国社会的权利，以及在诸如受警察保护和享受公共教育等公共服务上的各种要求的权利。为方便起见，我将把所有的这些普遍的权利资格都称为“权利”（rights）。我承认自己对这个术语的使用比大多数政治理论家所使用的含义要广泛，从而把言论自由和参观国会大厦的自由合并在一起考虑。

同样，权利也有消极的一面，这体现为强加在所有公民身上的某些义务。举例来说，每个人都有服从法律的责任——任何人仅仅权衡监禁惩罚的风险损失和从偷盗钱包中所获的收益，就违背了公民的义务。服兵役和陪审

① Irving Kristol, "About Equality", *Commentary*, Vol. 54 (November 1972), pp. 41-47.

② Harry G. Johnson, "Some Micro-Economic Reflections on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i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409 (September 1973), p. 54. 乔纳森把对不平等的关注部分归因于“一个天真的和肤浅幼稚的拟人主义”。

工作是公民义务如何被分派的例证，它们在原则上是随机选择的，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偏好或地位来决定的，尽管在实践上并不总是如此。

权利的特征

与经济资产形成鲜明的对照，权利的显著特征在于它们的获得与行使无须任何金钱上的费用。因为公民通常并不需要因为使用他们的权利而付钱，^①所以他们缺少平常的激励去节约使用权利。如果消防部门要为它的服务收费，那么人们在报火警时，就可能至少要有点迟疑，而且在防火上更为有条理。如果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有一个价格标签，公民可能在他们高谈阔论之前就更深思熟虑——或许这还会提高辩论的质量。但是社会并没有打算为行使权利定量。【7】

其次，由于权利是被普遍分配的，它们并不援引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原则告诉人们去专攻他们擅长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演出，包括那些没有才能的演员。有些人在平民事务中有着高超的技能，却成为毫无希望的不适宜的士兵。因此服兵役并不能提供最有效率的军队，但却是我们战时扩充军事力量的方式。投票者确实没有平等的能力、平等的信息或教育水平，或在政治决策上没有平等的利害关系。由于政治决策集中于税收和财政开支，所以财产所有者和纳税人才与此利害攸关，这种相对差异在接受普选中被忽略了。我们蔑视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论点，他认为把选举限制在财产拥有者上可能会有助于确保以一个深思熟虑的方式达至社会政策。^②类似地，尽管孩子们被排除在投票权利之外，但是我们仍然放弃甚至是最低限度的能力测验，例如把读写能力作为投票资格。

我们拒绝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建议，他建议应该根据成就和智力来区分投票权力，尽管他坚持说这种体制“并不……必然招人反感……”^③最近，一位作者在《纽约时报》的末版上追随穆勒，提倡一种“比例代表制，能够根据每个人被论证的做出理性选择的能力，对每【8】

① 金钱可能间接与之相关。参观国会大厦包括了交通费用。更严重的在于，获得法律面前平等公正的费用造成了本章中随后将要讨论的问题。

②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st ed., 1790; Penguin Books, 1969), pp. 140 - 141.

③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1st ed., 1875; Bobbs - Merrill, 1958), p. 136.

个人的投票按比例加权”^①。这样的提议表明社会分工与投票权利的分配相关，而且在给定这一基本前提后，这个提议才讲得通。但是一旦否定了这个前提，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会认为它们是可笑的。

权利的第三个特征在于它们的分配并不是作为激励、奖赏或惩罚。它不同于市场上的奖金或是其他方面非金钱的荣誉和奖励，额外的权利和义务通常并不被引进在社会上的有建设性事业中。原则上，人们的出色表现得到承认后，他们才能被提供额外的投票权或免除服兵役，并且这种奖赏也许会成为生产成就的附件激励。但是仅仅是在少数有限的和极端的情况下，例如被判犯有重罪而失去投票权利，社会才在权利领域建立了补偿物（quid proquo）。

一个世纪以前，为了倡导彻底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反对大量的、普遍分配的公共服务。斯宾塞的批评建立在几个基础上，其中就包括它具有非激励性的效果。甚至连公共图书馆也招来他的嘲讽。^② 总之，这些公共服务向人们提供了实际收入，而没有要求任何回报。实际上，免费图书受到双倍的谴责，因为它是增加了闲暇的价值的实际收入的一种形式。斯宾塞当然是在揭示某些古怪的社会态度，但是他的优点在于承认权利的低效率性。^③

第四，权利的分配强调平等，甚至不惜以公平（equity）和自由为代价。当人们在能力、兴趣和爱好上具有差异时，至少根据某些标准来说，同等对待就不是公平的对待。当公共教育的提供超出了税收收入时，很难把它辩护为对没有小孩的家庭或私人学校的监护人是公平的，不管它其他的优点多么有力。人们并没有被迫去行使权利——言论自由包括了保持沉默的权利，普选权并没有强迫必须要去投票站。但是义务却明显地侵犯了自由。而且，禁止人们买卖权利也剥夺了他们的自由。

权利不能买卖，这个重要的原则是权利的最后一个特征。不管是为了得到额外的其他权利，还是为了得到金钱或财物，权利的所有者，都不能把一项权利卖给另一个人。这种禁令公然不顾经济学家们的福利最大化的传统方法。正如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指出的：“任何一个不错的经济学低分二年级本科生都能写出一篇短文，证明选票的自愿交易会增进

① Joseph Farks, "One Man, 1/4 Vote,"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1974.

② Herbert Spencer,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Appleton, 1984), p. 33.

③ 当然，效率性论证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并不是明确的，因为获得图书的便利可以建立人力资本。

买卖双方的福利。”^①

只需一点想象力就能设想，如果允许交易，就会产生许多新的权利市场。禁止师徒合同式的服务显然是对自由交易的强制性限制，它阻碍了雇主投资于雇员的训练和技能，也阻碍了对买卖人格的双方都有利的交易。甚至一夫一妻制也可以改为允许自愿交换制，通过给每个人一张寻找配偶的可市场交易的票券，而不是一个不能转让的权利，一次只与某一个人（而且不能多于一个人）结婚。既然陪审费用昂贵，那么社会可以提供给任何放弃那一权利的被告一部分节省的费用。在军队服兵役的交易很容易设想，实际上过去也发生过。甚至服从法律的义务也可以市场化，在比喻的意义上，就像中【10】世纪教会出售赎罪券一样。^②

总之，权利的领域完全侵犯了对经济效率的微积分。我们的权利可以看做是低效率的，因为它们排除了可促进节约的价格，排除了诉诸比较优势原则进行选择，排除了能够提高社会生产积极性的激励，也排除了可能有利于买卖双方的交易。

权利的理由

那么，社会为什么要建立这些“低效率”的权利呢？权利的论证采用了三条路线——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人道主义。

自由

提倡自由放任的人认为，许多权利保护了个体公民不受国家的侵犯，由此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它所付出的经济低效率的代价。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必须是普遍的和无条件的，对它们进行管制、限制或歧视，就等于赋予政府随意处理的权威。任何投票资格的条件不能被出生证明的出示定下来的，将会给予某些政府官员以权力，而他们可能已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某些人排除在投票间之外。即使是由一个客观的神来管理读写能力测验是可欲的，却被一个官僚机构来管理也是不能容忍的。普遍性和平等性的好处在于，它们【11】是可鉴别的、客观的标准，因此难以滥用。因此，自由主义之所以拥护平

^① James Tobin, "On Limiting the Domain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3 (October 1970), p. 269.

^② 根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赎罪券“允许犯罪”是一个“流行的误解”。据说相反“赎罪券或许最好比作赦免对某个已经履行了某些良好工作的犯人的部分惩罚，而该工作并不直接与他的罪或惩罚有关”。不管怎么解释，购买赎罪券就是购买对神圣法律的通常运作的某种改善。

等，并不是因为它重视平等，而是由于它尤其重视一个有限的政府，这样的政府的权力被明确而客观的准则所限制。对自由主义来说，权利被视为主要是授予个人对抗国家的权利，这种观点对权利的要求明确地胜过个体在市场上的权利。^①

对平等分配的权利这种解释，只能照顾到由现行美国制度在事实上界定的部分权利领域。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公民把权利委托给（entrust）国家，以避免其他人侵犯他们的自由。它也无法解释公民自由或公共服务的整个领域。它更无法解释政府强加的禁止自愿交易权利的禁令。

为公共干预市场和公共服务所提供的传统的基本原理，建立在所谓的“外在性”（externalities）之上，这种“外在性”包含了第三方的利益。^② 环境管理是必要的，因为某一个体对空气和水的污染会伤害无辜的旁观者。国防事业和灯塔服务的生产不能留给私人企业，因为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仅使购买者获益，而使非购买者不获益。没有人被允许以牺牲他报火警的权利来换取税收削减的回报，因为他的左邻右舍将会因此而变得情况不妙。对这种【12】交易的禁令看起来被外在性充分地解释了，但是还有许多其他禁令并没有因此而被解释，例如禁止交易投票权。^③ 即便诉诸外在性，自由也无法彻底解释美国社会中权利的全部限度。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的讨论，可参见 F.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pp. 85 - 88, 103 - 107, 153 - 155。

② 关于外在性的经典讨论，参见 A. C. Pigou,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Macmillan, 1920), pp. 115 - 116。

③ 禁止选票交易可以作为制止潜在的垄断的手段，这个有趣的（但对我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辩护是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提出来的，参见他们的著作，*The Calculus of Consen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pp. 270 - 274。他们的讨论有助于澄清选票交易中外在性的本性。考虑以下这种情况：如果安购买了鲍伯的选票，她就获得了凌驾于卡尔之上的权力，那么卡尔可能因而情况恶化（或者，如果安是他的盟友，他的情况会更好）。这有时候就被称为存在着某种外在性。但是，如果安是在拍卖市场上购买鲍伯的选票，她就只有在报价高于卡尔时才能获得选票——卡尔就有机会来内在化成本。如果他的报价没有高于安，那说明这选票带给他的利益不值这个成本。另一方面，如果这种交易不是发生在一个拍卖市场上，因此卡尔没有机会出价，那么失去了那个机会的福利成本与选票的特殊性质就没有关系。如果鲍伯把草莓卖给安，而卡尔可能也要买，这也强加给卡尔的一种福利成本。因此，凌驾于第三方之上的权力不是描述外在性的正确方式。相反，外在性的产生是因为选票作为可交易商品的特殊性质，竞选中胜利者赢得全部。摇摆不定的选票比什么都值钱，而所有其他的选票却一文不值。卡尔选票的价值取决于其他的选票在他的盟友和反对者之间如何分配。在这个意义上，在盟友和反对者之间的任何交易，对没有参与交易的选票持有人来说，都具有某种外在性效果。

多元主义

权利领域的另一条研究路径强调多元主义和多样化 (diversification)。这是由我的老师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所发展出来的。正如他所看到的, 首先, 在一个能够存活的社会中, 各种关系的网络需要建立在人的动机和人的利益的广阔基础上。物质获取 (在大多数情况下) 是推动经济活动的许多动机之一。反过来说, 经济仅仅是社会的一个方面, 并且必须被“嵌入进” (embedded into) 一个成功的社会之中。波兰尼发现了一个“市场社会”, 这个社会中的所有其他关系都从属于市场。^① 因此权利可被视为对抗市场支配 (market domination) 的保护力量。如果任何东西都可以为金钱所买卖, 就会产生市场支配。

除了经济学家, 没有人会问为什么钱不能购买某些东西。但一个经济学家却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市场范围内的每种资产, 都可以被金钱所标定的单一尺度所测量。所有可交易的货物和服务指定了它们的价格, 并且它们的价值都变成单维可比较的: 一本书等于十块面包或两打啤酒。市场评价的帝国主义解释了这种评价的贡献, 也解释了这种评价对其他制度造成的威胁。市场评价可以破坏它所看中的任何其他价值。如果选票与烤面包机可以以同样的价钱交易, 它们不会比烤面包机更值钱, 而且将失去它们的社会意义。

社会拒绝把自身变成一台巨型自动售货机, 以至于可以投进任何东西, 而所有东西都可以换取一定数量的货币。当我的同行有时忽略了这个原则时, 他们就带来了经济学家所下的最令人厌恶的定义: 每个东西的价值都知道的人, 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社会需要市场保持在一定范围。权利的范围是制衡市场的力量的一部分, 它用来保护金钱无法渗透的某些价值。基于同样的理由, 一个投资者的公文包里装着许多不同的股票和债券, 社会就会使自己的分配和供给机制多样化。它不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②

这些机制的其中之一就是把权利授予所有的公民。另一套机制在认可各【14】

^① Karl Polanyi, “Our Obsolete Market Mentality,” in George Dalton (ed.),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Beacon, 1971), pp. 59–77. 波兰尼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民主政治制度在限定市场领域中的有效性。因此, 他把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视为一个市场社会。

^② 同一理由导致我坚信国民生产总值不应该也不能够衡量社会福利。参见 Arthur M. Okun, “Social Welfare Has No Price Tag,”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Vol. 51 (July 1971), Pt. 2, pp. 129–133. 在这两种情况下, 我都论证社会福利是一个向量, 并且不能被一个数量 (scalar) 充分描述。因此, 我是一个强烈拥护多维社会指标的人, 并且也是一个强烈反对试图把所有社会发展和倒退的维度都转化为金钱量度的人。

种成就时，包含了各种非金钱的区分，并不等地奖励给不同的成就，但并不允许贴上价格标签。准确地说，这是因为它们不能用金钱来购买。奥林匹克奖牌和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资格作为激励力量有着特别的价值。还有一套机制包含个体之间建立在感情和友爱之上的自愿安排。人们需要友谊和爱情，为的是“他们本身”，而不是他们的钱。朋友之间的纽带不仅仅是相互的善意，也不仅仅是相互帮助的契约。这些多样化的机制使市场受到约束，同时避免社会变成一台巨大的自动售货机。它们是维持社会的黏合剂。

人道主义

对权利的第三种解释强调权利对所有公民的人的尊严的承认。哈佛大学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已经令人钦佩地发展了这一理论基础，他从社会契约论中推演出“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在分配上的平等”^①的原则。罗尔斯问道，在未来社会里，如果所有的规则起草者都忽略他们的阶级位置，并且忽略与他们的资产及能力相对立场来作为，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宪制（social constitution）将会被采用？用罗尔斯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原初位置”上，公正（justice）作为公道性（fairness）的含义将不被私人利益所扭曲而被大家所接受，因为所有参与者之间都无利害关系。他下结论说，这些开创者将会在“基本自由”中选择平等，而这种“基本自由”与追随自己的良知、表达他自己的道德原则以及参与社会决策的自由相关。

- 【15】 在罗尔斯的自愿结合中，每个成员都想要确保对自我尊重和所有公民的公道性的承认，因为这种承认能保护他自己。基本的自由是平等分配的，因为人们把平等评价为一种“相互尊重……属于人类的道德人格”^②。这些权利承认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的价值，它们的获得无须补偿物。它们始终伴随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因此这些权利成为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标记，成为人类尊严的一部分，并由于这个原因而呈现出额外的意义。由于它们是权利资格而不是救济品，所以人们可以无偿地接受它们，而不必感到像是吃白食的人。

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和人道主义对权利的解释并非不一致。在当代美国社会，这三种思想都在权利领域发挥作用。对罗尔斯式的平等的偏爱，是构成权利的特点和范围的基本因素之一。由我们的各种制度所建立的权利的本性，揭示出平等是我们的社会价值之一。

①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4 and chap. 4.

② Ibid., p. 511; see also p. 60, p. 250.